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
WENYI MEIXUE YANJIU CONGSHU

YUJING YISHI YU MEIXUE WENTI

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

谭好哲◎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
WENYI MEIXUE YANJIU CONGSHU

YUJING YISHI YU MEIXUE WENTI

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

谭好哲◎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谭好哲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
(文艺美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1-011620-4

I. ①语… II. ①谭… III. ①文艺美学-文集 IV. ①I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686 号

语境意识与美学问题

YUJING YISHI YU MEIXUE WENTI

谭好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1620-4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语境意识与中国美学现代性研究	(1)
美学民族化与本土性问题的叩问	(8)
“里仁为美”：先秦儒家美学思想的元问题	(15)
二十世纪初叶美育新潮的兴起及其当代意义	(29)
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	(58)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意义	(82)
吕荧先生的人格精神与文艺美学思想	(93)
1985 年前后美学研究方法论热的学术史反思	(111)
从局部性理论替代到整体性范式转换	(122)
——对新世纪美学研究困境与转型问题的思考	
从形上思辨到现实关怀	(133)
——中国新时期美学的历史转型与时代特征	
论黑格尔美学中实践观点的萌芽	(143)
艺术哲学的革命	(156)
——论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的体系特征和审美理想	
超越形式禁忌与形式崇拜	(168)
——马尔库塞“美学形式”论探讨	
后经典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形态与主题	(178)
当代环境美学对西方现代美学的拓展与超越	(215)
“共同美”溯源	(229)

论审美中的想象活动	(238)
论丑的本质和根源	(248)
论丑在艺术中的特殊功能	(261)
——兼谈丑的美化与美的丑化问题	
文艺美学：美学创新的可行之路	(268)
论文艺美学的学科交叉性与综合性	(273)
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生成与理论进展	(282)
审美：创作动机的心理实质	(296)
批评：艺术审美的对象性建构	(307)
——兼论新时期主观批评一弊	
艺术“镜子说”再认识	(313)
——《审美的镜子》自序	
关于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思考	(320)
后 记	(335)

语境意识与中国美学现代性研究

纵观当下有关美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有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值得特别注意：这就是人们大多满足于直接搬用吉登斯、哈贝马斯、卡林奈斯库等人的现代性理论说事，而较少关注中国美学现代性的具体发生语境及其理论构成和呈现方式的特殊性。这就造成了如下阅读窘况：你不能说学者们的理论言说不对，因为他们所征引的理论观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权威乃至经典性的，而且这些理论一般也都有其历史与审美方面的现实材料可资佐证；但你又总是觉得这些源于西方的理论观点套用到中国美学研究中来似乎有些空泛、有点疏隔，没有落到实处。直白点说，正像前些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鼓噪一样，学者们依然是将生成于西方的理论言说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只要简单重复一下西方学者的观点就可以轻易地解决中国美学的各种问题，而忘记了任何话语行为都是生成于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语境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必然造成话语构成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美学现代性问题自然也不例外。

无论中西，作为现代性叙事的美学研究都是现代规划的产物。因此，对审美现代性及其理论表现美学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都应该置于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在与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的某种比较关系或张力结构中加以展开。这可以说是中、西美学现代性研究中相同的方面。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发生的时间、动因、速度乃至具体方面各有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生成的审美现代性

和美学现代性又必然是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我们不可仅看到相同的方面，却忘掉了相异的方面。从美学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来看，只有把相同和相异的方面辩证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认识。

大致说来，作为一种社会设计或制度模式的现代性首先发生于 17 世纪的欧洲；与此相伴随，随着中世纪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分化为科学、道德、艺术三个互相独立的领域，在专家的掌握之下，三个领域分别形成了认识——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审美——表现理性结构。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科学、道德、艺术三个领域虽然各自追求独立，但在瓦解中世纪的宗教世界图景，推动政治民主，促进人性解放等方面又是同盟军，共同集合于启蒙理性的大旗之下。当此之际，艺术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是并行不悖的，甚至是合一的，康德把艺术与道德、美与崇高连通，席勒以审美弥合人性分裂、宣扬美走在自由的前面，黑格尔以艺术调和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弘扬艺术的主体理性精神，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启蒙理性越来越导向了工具理性一面而消解、遗弃了道德——实践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于是审美——表现理性便越来越填补起价值理性阙如造成的空白，并且日益走上与工具理性相对抗的地步。因此，自 19 世纪中期以降，审美现代性与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社会现代性之间便越来越采取了一种对抗的形式。审美现代性的超越性、批判性、乌托邦性等等均由此而得来。但是在中国，情形就不完全如此。在中国，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发生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这比西方晚许多。这个时期及其之后的阶段正是西方的启蒙理性日益导向工具理性，社会现代性日益显露出其负面价值和影响的时候，而在中国现代性却作为一种拯救社会与人生的新的事物为社会所需求，为进步人士所期盼和鼓吹，工具理性与审美理性都是作为启蒙理性崛起于思想文化领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影响久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所标举的“德先生”、“赛先生”实为政治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同时期的西方它们已成为被反思、被批判、被以审美现代性加以对抗与超越的东西，而在中国则完全是被历史隆重接受和正面肯定的东西。至今，科学与民主依然是张扬新理性精神的中国学者所大力加以倡导和弘扬的。此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缘生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自我积聚和自我冲突，而有着外力强力迫压和干预的因

素。因此,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生与演进,一直存在着古今关系与中西关系的双线交织,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坐标系的参照下往往具有不尽相同的意义。这样一来,中国美学现代性问题便有了与西方不同的语境,美学视野中的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的关系便有了不同的语义关联。而其不同的语义关联致使中国美学现代性有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独异性。在此,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深入探讨。

首先一点,自梁启超鼓吹“三界革命”和王国维、蔡元培于20世纪初介绍德国古典美学以鼓吹美育运动起,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研究便有着强烈的救世主义倾向,也就是王德胜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①,以致形成了“审美功利主义”的现代传统。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研究,应该如何认识和评判这种审美救世主义或审美功利主义呢?我们知道,审美救世倾向不独出于中国,德国古典美学把美与自由的关系作为核心线索即突出地表现出救世倾向,席勒的美学尤其如此。或许是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尚处于分裂中的落后的德国有着相似的国情和民生体验的缘故吧,中国现代美学发轫期的思想家们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人都首先将目光聚集于德国古典美学,从那里获取理论借鉴以资社会和人生改造之用。但与德国古典美学不同的是,由于社会改革的外在迫力过于强大以及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实践理性精神使然,中国美学从一开始起就较少德国古典美学所有的那种形而上倾向,不是在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人性等抽象的理论关系和命题中思辨美学问题,没有把艺术审美与社会道德实践和科学认识活动截然区分开来,在纯然独立的审美王国中玄思人的自由。知识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美学最初是以改造社会和人生为目标的美育为开端的。无论是王国维借美育倡导“完全之教育”,还是蔡元培宣扬“以美育代宗教”,抑或是鲁迅张扬“摩罗诗力”,梁启超倡行“趣味教育”,其宗旨都在于美化国民、改良国家。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从一开始就不那么超然,不那么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乃至社会干预意向,从而与历史运行和现实的人生实践有着不解之缘。这种现实关怀和社会干预意向早先表现为借艺术和审美的名义发思想启蒙之声,而到后来随着国

① 见王德胜《21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二题》,《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又一步步踏上了救亡与政治化的旅途。因此，历史地来看，中国文学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便内在包含了审美与启蒙、审美与政治以及文学的自律与他律、艺术与审美的个体发生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规约和集体意志等多种关系。对此一类的理论关系，我们固然应该有基于权威理论参照的国际性或全球性比较分析的视野，但这种比较分析的视野不应仅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普遍性，一味地求同，同时更应该有基于中国特殊语境的具体分析与领悟体察，能从同中见出异来，从普遍性中见出特殊性来。像有些论者那样，以西方后期现代性中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超越关系来评判中国现代文学和美学研究，以审美理性否定工具理性和政治理性，甚至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启蒙理性、历史理性，似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其实，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封建时代的文学观念和审美价值理想来说，基于现代化历史进程基础而产生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所孕育出来的启蒙理性以至工具理性、社会理性以至政治理性，也同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是现代性的体现，审美现代性若能正确处理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们正确地融含于自身之内，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积极价值的。当然若处理不好，若将工具理性和政治理性导向极端，排斥以至压制了文学的自律和审美的个体自由，又会给文学和审美带来损害，这也是不待多言的。因此，对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的关系，应该作出具体的分析，不能不分语境统而言之。这方面非语境的简单化认识方式只能将中国文学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现代性的丰富历史蕴含抽空，从而作出片面化的理论认识和评判。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和美学研究的现代性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性问题的关联。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这种关联几近宿命性的，是任何刻意的超脱姿态都摆脱不开的，同时这种关联又是变动着的，在变动中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性以及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关注意向和理论认知着眼点。现代性作为一项社会规划工程，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生成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审美领域表现出来，就是对民族性的追求和自我认同。民族主义首先生成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也首先在西方各国得以建立。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统治以及东方各国自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民族主义观念也

出现于东方，并且形成了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性运动。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悠久文明古国，并且很早就形成了历代仁人志士为之成仁取义而自骄无悔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迷梦，中国也终被拖入现代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以后，经历了时代洪流和现代国家观念洗礼的传统民族意识便一跃而演进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观念。自清末维新派和海外留学生最早将“民族主义”一词引入中国之后，“民族主义”便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紧密纠缠在一起，成为各派人士不得不倍加关注的问题，建立现代化的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名界爱国志士所追求的奋斗目标。与此同时，现代教育、文学、艺术、科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便与这个新兴民族国家建构理想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既有其外来压力的动因，又是进步人士面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古变局和世界潮流所作出的自觉选择和追求，因此，民族性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在不同的主体那里和不同的时期便有了不同的意义和语义关联。对保守、腐朽的封建顽固派而言，与现代性相关的一切东西都不啻为洪水猛兽，而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则是抵御这洪水猛兽的力量和法宝；对激进的西化派来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而传统的民族的东西则是西化的绊脚石，必欲彻底抛弃之而后快。这种将民族性与现代性截然对立起来的极端做法，在 100 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史的不同时期都能找到其理论表现和代表人物。比如五四运动时期就既有激进派的彻底反传统，也有《甲寅》、《学衡》派的一味死守传统。再如当前学术界也有一些人或是一意张扬西学话语，或是固执守持狭隘民族主义立场。这是特殊的情况。一般的情形则是，由于引发民族性的历史机缘不同，民族性问题以及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往往呈现出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意义和关系格局。就美学研究而言，在中国美学发展的早期，美学研究的显在价值取向是追求现代性，所张扬的是现代的审美观念、现代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但这种追求是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要解决的是中国的社会、人生和审美问题，所以它并不排斥民族性，或者说它隐在的价值取向又是民族性的。比如梁启超的新民说引进介绍了大量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观念，但其意图是新中华之民，而且他最早引用了“民族”这个概念。王国维从德国古典美学引进了现代新的美学和美育观念，但他又用这些新观念研究《红楼梦》，改造传统的意

境理论，甚至去发见孔子思想的美育意义。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这些努力，就使得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他们的文学和美学研究，既是现代性又是民族性的。尽管中国现代美学是在痛苦地认同中国历史的西方发展道路和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发端的，但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追求一开始就没有抛却民族性，而是给予了民族性以应有的位置和肯定性价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可惜的是，中国美学在五四之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偏向于现代性的一极，而所谓现代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倒向对外来话语的一味搬运和模仿，以致患上有的学者所谓“失语”的病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界，曾在文学民族化方面作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但这种思考又因为政治现实和政治思维的干扰而常常摇摆不定，没有展开更深入的理论探讨，结出更丰硕的理论果实。此外，像宗白华、郭绍虞、钱钟书等一批学者虽在传承与发展中国传统诗学和美学方面作出了不菲的实绩，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构成中国现代文论和美学的主流，他们在文论和美学民族化方面的贡献也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期间的原因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深思。至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美现代派文学和理论观念的引进，文学的现代性（当时也称现代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又以不同的理论思考（如中国文学要不要现代化？中国应不应有自己的现代派文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如何？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还是说民族性是一个纯然防御性的口号？）浮上学术台面。而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近年来又成为学术界包括文学理论和美学界思考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全球化乃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最新表现形式，所以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但就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又有了不同的语境。如果说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在落后挨打的现实教训下启动的，带有相当被动的成分，所以民族性的建构既可能成为现代性追求的主体动因，也可能成为既追求现代性又防止现代性沦为全盘西化的文化制衡力量，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拒斥现代性的主观理由，但无论如何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和理论认同的文化精神和理想模式，相对于民族性而言是占有了时代优势与话语优越性的。而在今天，中国虽在社会现代化的程度上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距离，但建立现代民族国

家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持续进行现代化建设也已成为全民族自觉主动的选择，这时民族性问题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蕴含。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民族性，已不是落后挨打时渴望自身强大的民族性构想，也不是闭关锁国年代盲目排外的民族性的自大和自狂，而是在自强、自信的基础上与世界各民族平等交往、共谋发展过程中既能够推动全球现代性事业的发展，又能在其中显示出中华民族卓尔不群的实力、贡献与风貌的民族性。因此，在今天，现代性相比于民族性并不具有特别的时代优势和话语优越性。正如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中心的建立，意味着西方化，相反却意味着中心的缺失，意味着联合与分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向发展。^①可以说，当今的全球化已非单向度的西方化，它一方面意味着现代性工程的世界性展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民族国家更多参与世界事务包括文化共建的可能性。换言之，在今天，现代性工程是全球性的，也必然是民族性的，是需要由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来实现的。因此，中国人今天来谈论民族性问题时，不会再有那种面对强敌，感觉万事不如人时的自卑或自弃心理了，当然也不必且不应再有以往那种对于现代化可能流入全盘西化的戒备心理、那种既向往又惧怕的矛盾心态了。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性的现代民族文化的建构图景正在现实地展开。美学研究也同时共存于这一现实图景之中。对美学研究者来说，问题在于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究竟能够从什么角度、在多大的深度上切入美学研究领域，我们又能提出和解决哪些缘自我们民族自身发展境况而又具有世界性关联的时代性课题。美学作为一门感性认识的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生成于对人类感性生活的体验和认知。美学研究要成为既是现代性又是民族性的学术建设工程，就既不能脱离开现代的观念、视野和思维，也不能脱离开民族感性生活的母体和根基。而从人们通常仍然习惯于用西方学者的观念和理论言说美学问题来看，美学的民族性建设的确还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任务。它与美学现代性的共生关系和互为依存的内在理论格局问题也还需要美学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① 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美学民族化与本土性问题的叩问

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研究学科，美学在中国已有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百年时间不可谓短，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美学研究从基本观念、概念范畴到体系构架却基本上依然都是从西方输入过来的，只是从作为印证观点的部分艺术实例和少量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才让人依稀感觉到一点点民族化的征象和痕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百年中国美学的历程更多地像是“西方美学在中国”，而“美学的民族化”却仍是一个需要努力才有希望实现的理想。这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今，从这样的起点上展望未来，人们于不满足之外又多了几分焦虑，因为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的民族化包括美学研究的民族化似乎更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

应该说，如果我们继续因循着先前的研究思路做惯性运动，继续追随在西方学者后面鹦鹉学舌，做学术上的二道贩子，从而把学术领域里的全球化语境理解为并实际地弄成单向的西化取舍与被动摹仿，美学研究的民族化就真的可能成为一个水月镜花的幻象。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对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对美学研究与民族发展和本土文化创生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一种深切的理解和正确的处理，真正找到美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相依共生的联结通道，美学的民族化就可能由理想生成为现实，就可能结出我们所期望的丰硕理论果实。对中国美学来说，最终是收获苦涩还是收获喜悦，全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希望孕育在努力之中。

以经济领域里资本和信息的急速流动与扩张为动力的全球化浪潮的确来

势汹涌，将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卷入到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向绝不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西方化，仅仅是世界向欧美中心的向心化运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概念所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这种全球性效应并不表明新的世界中心和秩序的建立，相反，“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因此之故，“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①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鲍曼是从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史无前例的自由，成为“不受形役”的“全球人”，却把另一部分人固定在其“本土”，并且破坏了这些人传统上由与他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与其自己的生存之地的亲合性联系，使之患上了失去生存根基的空虚症。因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就成为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

撇开鲍曼对全球化的某些消极后果的分析是否完全妥当不论，鲍曼的全球化理论言说其实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建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目标，最终的全球性的效应，是由不同利益主体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互动造成的。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世界的可能，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多元存在、能动创造的可能。所以，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依然有一个国家主权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民族利益问题。其次，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体两面，是一个趋向相逆的矛盾运动过程。因

^①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2页。

此，在展望全球化的景观时我们应该有一种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关怀，而在思考本土化的相关问题时又应该有一种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世界性互渗、互动的眼光，这样理论研究才不至于走向片面化和绝对化。

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出发，对近来人们关注颇多的美学与文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我们当会形成一种更具时代意味的理论自觉，获得更为明晰的理论言说语境和问题分析构架。既然全球化不纯粹是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还有一个民族利益和本土化的问题，因而美学研究的民族化问题就不是哪个理论家心造的幻影，就有其话语生成的现实基础，不存在是否狭隘与保守的问题。那种认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美学和文学研究只有摒弃理论话语的民族自性和地方限制，用世界通行具体说就是用西方人通行和认可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才有出路的观点是片面的。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能够向全人类说话，我们不怀疑那些倡导用世界通行的话语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学者是怀有这种追求的。但是任何有价值的对世界学术有所贡献的理论话语，都是富有民族特性的，美学研究也不例外。通观古今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性美学话语，如古希腊的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现代欧洲的存在主义美学和英美的分析美学等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烙印。就此而言，民族化的追求与世界性眼光与胸怀不是矛盾的，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美学而后才有望提升为世界性的美学。而那些企图抹去民族的印记和痕迹，一味跟在西方学者身后拾人牙慧的所谓美学研究，虽有一种所谓“世界性话语”的眩人名份，究其实却不过是重复与模仿别人的“世界性”，与自身的创造是毫无关系的，通常也是没有学术生命力的。

鉴于上述的认识，当前我们应该在理论层面上形成这样一种自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强调美学的民族化建构，从消极意义上是要对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同现象保持一份必要的警惕，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单向文化趋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世界文化正因其多元和多样才显得丰富而多彩；从积极意义上，就是要努力确立和保持中国美学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民族身份，并藉由这种身份而在世界美学和文学研究大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结束西方美学在中国单向的扩散状态，从而在美学的世界性建构中也融入中国美学家的民族智慧和理论贡献，在中外美学的交流中既拿来又输出。既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没有被时代大潮所淹没，那么我们也应该有信心在全球文化共建包括美学研究中会做得同样好。

在以往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是用一维的历时性时间尺度评价和认识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把民族性等同于传统落后的东西，把西方的美学等同于现代进步的东西，认为用西方现代的东西取代传统上民族的东西是学术进步的必然；而现在，我们把民族性的追求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共时性地置于新世纪现代美学的建构目标之下，这应该说是以往研究心态与思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超越和转换。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美学发展策略，如何在美学民族化的追求中走向世界美学的互识、互渗、互动与共建呢？对此，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并作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比如有人主张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同时加进一些本土的批评话语，使他们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以达到积极介入国际理论活动和争鸣，发出中国理论家自身的声音之目的。^①也有学者认为，在全球性的视野中，应充分而深入地探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性和历史存在形态，通过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找到对外进行平等有效的学术沟通的“对话性”的基点和根据，促成中国美学在新世纪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学科建构。^②这里，前一种策略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后一种主张是吸取传统的营养以健全现代的肌体。两种思路都着意在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凸现民族化问题。从中不难看出，将美学研究的民族化追求与全球性视野有机地结合起来，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以上两种主张，基本上还只是一种宏观研究理路上的考虑，具体到美学民族化的建构来说，则尚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才算是本土性的话语呢，美学话语又是如何获得本土性的呢？又比如说本土传统的学术资源是如何获得现代转换的动因的，又是如何获得进入现代中国美学学科建构的“历史的现实合法性”的呢？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需要一步一步地加以深入的追问和探讨。只有通过这类追问和探

① 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② 王德胜：《清理与转换：本土学术资源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讨，本土性话语才能逐渐地凸现出来，民族化的美学才有望被建构起来。换言之，在大的发展理路明晰之后，问题意识的确立，尤其是与全球化进程相关联的本土性问题的叩问和凸现，又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建设走向民族化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理论学科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支撑其体系构架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也就是新旧问题丛生与延伸、交替与更迭的历史。而问题生成与解决的历史即是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鲍桑奎在其《美学史》中经常用“美学哲学的问题”、“美学问题”之类术语，并有诸如“近代哲学的问题”、“康德——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美学问题在他的体系中的地位”、“为什么审美判断是美学问题的解答”等提法，这里的所谓“问题”都是指包含了通常所说“问题”的理论本身而言的。可见，问题与理论实在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通常我们常说某人的学术研究有新意和创见，实际上就是指他的研究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问题或者能够对业已存在的问题提出有创见的解决思路 and 办法。因此，问题意识对学术的发展是必须的，是学术理论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因素。美学研究亦复如此。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等，之所以能形成世界性影响，在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都在于其中隐含了各自独特的美学问题，而且这些美学问题又都不完全是从抽象的思辨与玄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美学家们各自身处其间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处境中孕育和诞生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当我们的学者追随着西方美学家的思想理路，运用着由他人那里撷拾的理论话语进行美学的研究时，却恰恰忘记了从自身生存处境生成的问题意识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性。学术界所谓中国美学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失语症”正是与自身问题意识的缺失紧密相关的。就此而言，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的美学研究有时显得很热闹，很有学科建设意味，但由于其就美学而言美学的基本倾向，且过分地流入对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学问题的抽象思辨（虽然这种思辨也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较少与民族的生存处境及文化创造相通，所以大多是不那么打动人 and 吸引人的，不能让人经历一种文化创生的痛楚与喜悦。因而在与时代、人生与民族文化的共生、互动方面，比起上世纪前半叶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人在美学研究开端期的作为来就逊色得多。20 世纪初叶，当王国维等人